

叙述探索提升小说品格

段崇轩

当下短篇小说，在叙述形式、手法与语言方面，已然十分成熟。过去对小说的认识，总是局限在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模式中，小说叙述学打破了这种模式。它把文本的内容与形式看作一个整体，从作家叙述的角度、构成、语言等层面观照文本，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创作理论。正如徐岱在《小说叙事学》中说的：“小说的叙事学所要加以把握的主要对象，是小说世界中的叙事结构与体系，其目的是揭开支配着小说叙事艺术的各种因素与奥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具体的叙事法则与规律。”譬如小说的叙事结构、构成要素、基本模式、叙事修辞等。小说叙述学的实践，使小说的面貌与品格有了很大提升。

有些作家坚守现实主义写法，但在叙述形式与语言上进行了多方探索，同时又运用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表现方法，使小说变得丰满而多姿。刘庆邦的《挂在墙上的弦子》写的是农民工潘明华与曲胡——弦子的故事，他酷爱民间的曲胡，外出打工只能把它挂在家里的墙上。妻子与女儿思念他，曲胡成为她们的家常话题。当他春节放假回来，右手失掉了两根半手指，他依然给妻女拉曲胡。这是一个既温暖又悲伤的底层民众故事，作家借用了浪漫主义手法，给曲胡赋予了灵性与生命；汲取了意识流手法，表现妻子在曲胡声中游离。特别是在叙述语言上，融叙述、描写、抒情、议论为一体，自由转换、行云流水，有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草白的《茶树王》同样是2022年的短篇佳制。作品以摄影师“我”为叙述者，讲述了“我”前往布郎山给一位老茶人拍照片、寻找茶树王的故事情节。茶山的浩瀚、葱茏、神奇；老茶人宋易安年轻时的打虎壮举，如今的苍老和木讷；茶树王的神秘、难寻、巍然；特别是写“我”在大自然中的震动、净化，对世事、人生的沉吟、领悟，夹叙夹议中有关抒情，还有意识流、梦境、内心独白，形成了一种协奏曲般的叙述形态与格调，凸显了老茶人、茶树王的象征形象，在二者身上凝聚了自然、宇宙的精气神。

许晨晴在《试论元小说的叙事特征》中说“元小说”叙事“被称为‘关于小说的小说’，其主要是以小说的形式对小说进行反思和创作，关于自身的虚构本质和创作过程，又被称为‘自我意识’‘小说’‘超小说’等等”。这种叙事形式兴起于新时期文学，当下依然有作家在运用。钟求是的短篇小说扎实而丰满，《比时间更久》写一位生命将终的老父亲周文振，费尽周折改名字的故事。文本由“虚构部分”和“非虚构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写的是老教师周文振为人师表的历史和他深藏的年轻时的恋情；后一部分写的是儿子“我”寻找父亲当年恋人的过程。前一部分是作家无中生有的艺术想象，后一部分是作家不期而遇的真实见闻。小说与现实对接，是作家的奇思妙想。裴山山的短篇小说灵动而有趣。《事情不是这样的》写作家“我”在《红围巾》中描述的军人爱情的由来，与若干年后寻找西藏老兵的情节。“我”的小说是根据生活原型创作的，而廖老兵误把小说当成写自己，向“我”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小说改变、丰富了生活原型，而生活的真实又校正、补充着小说创作。二者的关系竟是如此紧密、奇妙。李浩的《像是影子，像是其他》写的是家族系列小说，作品主人公是“我”的爷爷。这位地下工作者、中共滨州市委副书记，负责党的财政工作，保管着一大笔经费，有许许多多残缺而神奇的传说。这无疑是爷爷的真实行状。但在奶奶、四叔、父亲的讲述中，爷爷变成了“病弱鬼”“不着家的”“换命人”等，爷爷被丑化、误解、神化。既像是真人，又像是影子。而“我的小说就建立在这样既真实又虚幻的基础上，历史、传说建构着‘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结构着历史、传说。这是对元小说的创造性运用，又借鉴了复调小说的写法。

叙述学中的人称、视角，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选择一种巧妙得当的叙述人称、视角，对于一篇小说至关重要。一般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三种叙述类型。当下短篇小说在叙述人称、视角设置上，已然十分成熟。第一、第二人称是使用最多的。在2022年的短篇小说中，也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创新。李约热的《绝美之城》采用了第二人称叙述，小说中“你”是一位姓李的作家，由“你”的纪实小说，引出了案件当事人小栗、老楼，由“你”的家庭生活，引出了出国留学的女儿李曼。这些不同身份、命运的人，都在挣扎、寻找乃至赎罪，表现了现代人“似乎每个人都在颓败，颓败之中有烈火的蓬勃”的精神状态。如果用第三人称“他”替换第二人称“你”，就不会显得这样深切、激越。第二人称是一种奇特的人称叙述，但尝试者并不多。罗伟章的《芦苇》选择了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但这个“我”不是一个活的人，而是一个死者的灵魂。生者曾经是哲学专业高材生，有过美好的爱情与家庭，但命运不济，在公司做一个小职员，因妻子出轨一怒之下剥夺了他人的生命。当生者被抓捕执行死刑后，灵魂久久不散，痛苦地回忆自己的人生，反思自己由善变恶的历程。选择灵魂的叙述、自省，可以更自由、深切地表现“人”的感受、思考，强化小说的吸引力。

小说叙述学是一种宏阔精微的文学理论。西方叙述学自成体系，中国叙述学独具特色。新时期以来小说叙述学成果丰硕，但这套理论与创作实践却有隔膜、脱节现象。学者的理论很难转化为作家的创作手段，作家对叙述学的吸纳还停留在粗浅、零碎的层面。只有理论与创作结合，批评家与作家的“结缘”，才能推进叙述学理论与实践的全面提升。

④

2022年短篇小说批评系列文章今日结束，感谢读者关注。——编者

从文学到影视： 迁徙不止于好故事

许 莹

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不久前落下帷幕。活动期间，“文学与影视”成为提及度很高的话题之一。

电影展今年新设“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单元，由王安忆、刘亮程、田耳等作家创作的18部推荐作品受邀参展。作家们还举办了8场读者分享会，为电影展带去浓厚的文学气息。

评论家杨庆祥谈到，“迁徙计划”一是打开了文学的出口。相对于数码技术和图像书写的直接性和可感性，文学所依赖的文字叙述和物质手段相对间接且保守，这是文学的魅力之一，并不意味着文学要拒绝当代技术和更富有传播力的新介质。相反，文学如果以合适的方式拥抱当代技术，会获得更多的出口。二是丰富了电影的入口。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紧密相连，历史上电影的黄金时代也几乎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很多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改编成了优秀的电影作品或者给电影创作提供了灵感。文学人和电影人应该双向赋能，将人文精神、深刻思考锻造为真正杰出的艺术品。三是在打通出口和入口，重建文学和影视良性对话通道这一点上，“迁徙计划”显示了强烈的问题关切和全链条的产业意识。

文学和电影当然始于个人的智慧、灵感以及奇思妙想，但其开花结果需要大量的分工、协作和集体劳动。“迁徙计划”搭建了一个有效平台，让更多业界力量进入，以此提升业界的整体产业水平。在杨庆祥看来，迁徙意味着一种流动性，从文学到影视是一种流动，从一名观众到另一名观众、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电影也是一种流动。文化的精魂就在这一迁徙的流动中不断锻造、升华。

作家刘亮程认为，文学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的影视制作过程，“文学的种子最早是一幕幕的往事，那些曾经的假如遗忘深处的情感往事、生活的琐碎片段逐渐由一位作家从尘埃中打捞出来，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他希望这些“文字保管”的画面能还原到电影中去，让感动的画面再度浮现。

朱山坡强调“迁徙计划”的必要性，“从文学到影视，不单单是故事的迁徙，更是思想、灵魂的迁徙”。双雪涛也认为，“文学作为一个基础配以新的技术，能把有趣的灵魂、思想传到更多的地方，这是文学迁徙计划的意义所在”。

迁徙，不止于好故事，文学与影视的融合接轨、精神滋养、互学互鉴、产业合作将助力文艺创作勇攀高峰。



黄典林

如何在众多的扫黑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如何在借鉴前人创作经验的同时又能体现当下的时代精神？如何在准确传达扫黑除恶背后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的同时，又能兼顾影视创作艺术性以及网络化时代观众的内容需求和审美偏好？近日播出的扫黑题材电视剧《狂飙》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探索。

该剧最大的亮点是对既往此类题材剧作创作思路的创造性突破。《狂飙》同样与扫黑除恶行动的大背景有关，但更加凸显的是进入扫黑除恶工作常态化和开展政法队伍内部教育整顿这一新阶段后，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黑恶势力的滋生、政法队伍和体制内保护伞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紧密相关。体制内外环境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性的复杂性，成为该剧创作者着力突出的重点。

通过把人物和事件融入长时段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狂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2000年到2006年再到2020年，安欣和高启强这两位主角人物交错的人生和心路历程、政法系统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抉择，以及作为国家意志代表、以清理政法队伍和彻底铲除黑恶势力为终极目标的指导组，都在京海市这个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缩影的社会舞台上轮番登台。而该剧的剧名“狂飙”二字，既指向这20年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快速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也凸显了坚定不移铲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法队伍、捍卫公平正义的国家意志。

这种长时段、前景背景平衡呼应的叙事方式，让剧作既避免了表达过于刻意、生硬，甚至喊口号、背文件的窠臼，也能够通过当下与历史的多线叙事和前后呼应，展现扫黑除恶常态化的历史逻辑和社会基础，从而拓展了传统扫黑题材剧的广度和深度。

在这种思路下展开的剧情铺陈和人物塑造，就不可

能是简单直接的、非黑即白的。无论是正邪力量之间的胶着和对抗，还是不同角色人物的人性发展和命运抉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充满复杂性。正是以这种复杂性作为基础，剧中人物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史、人格特征和鲜明个性。

比如，作为全剧的核心反派人物，高启强从一个鱼贩子一步步变成涉黑人物的人生历程，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与当地政界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是该剧展现的重点之一。通过对这一涉黑核心人物20年人生历程的生动展现，《狂飙》指向了黑恶势力沉渣泛起、长期无法彻底铲除的社会根源和相应的解决之道。

与此相对照，剧中的正面主角人物安欣，在2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意气风发、正义凛然、一心要将黑恶势力绳之以法的年轻干警，到成为一个洞悉体制内环境复杂、知道仅凭自己一己之力注定一事无成的基层干部，同样也经历了令人唏嘘的人生变化。人到中年的他满头白发，既昭示着一个初心不改的正直干部所经历的沧桑命运和岁月蹉跎，也意味着个人的能力和良知一旦失去组织的制度化支持，就难免会陷入困顿。

正是在这种对个人命运的前景化呈现的背后，第三条主线，即国家意志本身的调整和更新开始浮现出来。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的到来给安欣带来了希望，最终保护伞被揪出并绳之以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和政法队伍内部教育整顿行动的开展，正是国家自身以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魄力实现自我净化的具体体现。

通过把时代背景、人物命运和国家意志有机融入剧情的发展之中，《狂飙》很好地回应了黑恶势力缘何而起，又将如何根除的时代之问。这种讲述方式不生硬，容易让观众接受。希望该剧既能成为让人有些审美疲劳的诸多扫黑题材剧中的一抹亮色，也能为今后政法类主题剧作的创作提供借鉴。

(图为《狂飙》剧照)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姚以价，是一位被历史烟云遮蔽的英雄人物。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省城一家报纸策划了系列纪念文章。这组文章写得精彩，但文中说姚以价是“山西版的黎元洪”，让我感到有些惊讶。我开始关注姚以价研究。当时国内没有一本姚以价研究专著，姚以价研究基本处于零星分散的状态，况且各种史料对姚以价在山西辛亥起义前后的记载，有时也相互抵牾，让人摸不着头脑。姚以价成为一个云山雾罩的“神秘”人物。

当时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为姚以价写传记。自1912年姚以价离开山西漂泊各地，关于他的活动，只有一些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述，散见于浩若烟海的资料中。记得2013年，一次偶然和原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王西兰老师聊起此事，王老师鼓励我把姚以价的传记写出来。我加大了资料搜集力度，开始着手评传的写作。我一再提醒自己：写作历史人物评传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求科学严谨，不虚夸，不拔高，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我拟定了写作提纲后，并没有从第一章开始写，而是先写了第八章《将门虎子》。这一章主要是写姚以价长子、中共地下党员、抗战烈士姚第鸿。《将门虎子》的2万多字很快以三个专版的篇幅在《黄河晨报》刊出。牛刀小试，初战告捷，增加了我完成评传写作的信心。

评传要有血有肉、立体全面地反映姚以价的一生，就必须扑下身子、踏踏实实地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资料搜集及案头工作。我写作评传的优势有三点：第一，这是我感兴趣的课题，20多年的时间，我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接触我的传主。第二，网络时代，获取信息比从前途径更多也更加便捷，比如通过孔夫子旧书网和家族成员的收藏，我终于找到了《世风校正》两个版本全部篇目的具体内容；比如通过和我丈夫的本家叔叔、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姚国璋先生频繁的微信沟通，我解决了有关姚以价书法的一个又一个疑惑。第三，由于姚以价是家族先辈（我丈夫的二曾祖父），我在搜集资料时有其他作者不可能拥有的便利条件，在姚以价生活了20年的西毋庄南

巷，我和爱人在一次次走访中找到了颇为珍贵的老照片以及异常生动的写作素材。

我是一名业余作者，所在企业工作节奏快、事情多。我的写作时间主要集中于每天早上的4点半到6点。电脑前一杯冒着热气的清茶，每天平均五六百字的进度。我像一头老黄牛，在万籁俱寂的凌晨时光里，勤勤恳恳拉自己的犁、种自己的田。

写作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很多，比如资料不足又一时无从找起的困难，比如史料真伪难辨无从取舍的焦灼，比如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表达方式短时间内又难以突破的困窘。书稿的写作是一个遇到困难、接受挑战、最终克服的过程，我无法放弃也不能放弃，只能努力寻找灵感和突破。在这个过程中看了几百万元的资料呢？我没有确切统计过，三、五百万是没有问题的。有一段时间，对一些史料特别纠结，理不出头绪，几次半夜从睡梦中摇醒爱人，和他讨论分析。当书稿终于完成的一刹那，我的心底充满了感激。感谢师长、亲友的支持与鼓励，也感谢自己的韧性坚持，我知道，我尽全力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寂寞国士姚以价评传》（团结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写作前后跨越6年，这是我与传主之间一场穿越历史时空的对话。“姚以价是一位英雄，可千万不能写成隔壁的二大爷。”在动笔之前，王西兰老师就严肃而认真地提醒我。我意识到，文章不能满足于对姚以价生平活动的介绍和历史事件的叙述，我必须努力走进他的内心，努力还原他丰富博大、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努力揭示他在一个个特定历史时刻行动背后的内在逻辑，使人物在我的

双塔

让散文好看又耐读

李林荣

沉潜与跃升

王秀梅

笔下鲜明、饱满、立体、真实地“活”起来。这一点，我在心理咨询方面接受的培训和知识，给我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因为它让我获得了解读、洞悉人性的密码和钥匙。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对我来说，也是沉潜和跃升相统一的过程。沉潜其中时，我和笔下的人物一起痛苦、落泪、激动；传主深沉的家国情怀、遭受困顿不屈不挠的高傲灵魂、对真理执着求索的精神品格，也给我强烈的感染与鞭策。沉潜久了，思想认识的跃升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我感到越来越接近传主。传主遭受了少年丧亲、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人生三大不幸，但命运的磨难从未让他屈服，他没有沉湎于一己的人生苦痛，而是将目光放在了挽救国家、唤醒民族的事业上。传主既可作上马征战、威风凛凛的将军，亦可作乡间拾柴、孑然独行的老者，不论人生绚丽也好、平淡也罢，不论在鼎沸的名利场也好、偏远的乡间也罢，他均可以安然自适，这种豁达敞亮的人生境界，为我树立了人生的标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的表达、艺术的呈现，对完成姚以价评传写作至关重要，也是我在评传文本呈现上的自觉追求。在写作手法、语言锤炼方面，我一直力求做得更好一些，但毕竟是第一次写评传，努力的结果如何，心里是颇为忐忑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我此刻的感受，与这新妇心情相似。

“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者创作谈 ④